

## 19 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学者关于工业化时期 英国土地流动的研究综述

郭爱民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7)

**【摘要】**19 世纪晚期,西方学者开始探索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问题。这些研究包括三个类型。第一类是土地流动的学理式解读,第二类是土地流动的专题研究,第三类是与土地家族有关的土地流动个案研究。第一类研究只是观点的提出。第二类研究涉及到圈地、市场、社会价值、继承四种与土地流动相关的因素;每种因素影响下的土地流动都有待深化(或展开)。第三类研究以某个土地家族的经济和社会活动为个案,其中点缀着土地流动问题;土地流动的单个家族个案研究也有待于展开。以多重视角观察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深入了解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土地流动、工业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是研究这一时期英国土地流动问题的趋向。

**【关键词】**西方学者;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综述

**【中图分类号】**S-09;K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459(2016)04-0080-11

### 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es on the Transfers of Land in Britain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by Western Scholars since Late 19th Century

GUO Ai-min

(Colle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7)

**Abstract:** In late 19th century, western scholars began to research the transfers of land in Britain during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Such research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e first category involves the researches, the method of which is only putting forward opinions. The second category deals with four kinds of factors involving transfers of land, which are respective enclosure, market, social value and inheritance. Nevertheless, such kind of resear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ach of the four factors and its according transfers of land should be furthered (or extended). The third category concerns the research in the case of landed family, in which there dot with some arguments on land transfer. And the third category should also be furthered. The research which concerns lands transfer in Britain in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from multi perspective and which further deals with relationship between agricultural labour productivity, land transfer, and industrialization should be the new direction on the problem of land transfer during the period.

**Keywords:** western scholars; the period of industrialization; Britain; the transfers of land; summary

**【收稿日期】**2016-06-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多视角透析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与经营”(13FSS008)、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资本主义时代欧洲农业经济组织研究”(15ZDB061)。

**【作者简介】**郭爱民(1970- ),男,历史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经济史、比较经济史研究。

英国工业化时期(1700–1870)<sup>①</sup>的土地问题一直是西方经济史界关注的热点之一。19 世纪晚期,西方学者开始以学理的方法,研究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中的某些问题。进入 20 世纪,一大批经济史家脱颖而出,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问题,并展开相应的争论,一场旷日持久的探讨拉开了序幕。

## 一、关于土地流动学理式解读的综述

在一些西方学者的作品中,分散着土地流动的观点。这里,笔者把这种只有观点没有具体论证的研究方式称为“土地流动学理式解读”。下面,对马克思、阿诺德·汤因比、阿什利等研究者关于土地流动学理式解读的相关论点作以罗列。

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散布着土地流动论点。他认为圈地运动是通过法律工具掠夺农民土地的手段。他提出,“十八世纪的进步表现为:法律本身现在成了掠夺人民土地的工具,虽然大租地农场主同时也使用自己独立的私人小办法。这种掠夺的议会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围法’,换句话说,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当作私有财产赠送给自己的法令,是掠夺人民的法令。”<sup>②</sup>同时,在马克思看来,清扫领地运动是英国进行的最后的也是较为彻底的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的手段。他说,“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过程,是所谓的 Clearing of Estates(清扫领地,实际上是把人从领地上清扫出去)。……在已经没有独立农民可以清扫的地方,现在是要把小屋‘清扫’掉,结果农业工人在他们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sup>③</sup>至于圈地运动、清扫领地所导致的土地流动的具体细节,马克思则没有展开论证。

在阿诺德·汤因比 19 世纪晚期所著的《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的演讲》一书中,可以发现土地流动的某些观点。他认为,革命之后,土地乡绅在英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完全控制了从国家到地方的行政权力,作为社会政治权力基础的土地成了他们狂热追求的对象;对商人来说,只有首先成为地主,才能获得政治权力和地位;从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城市商人开始通过购买的方式扩充土地<sup>④</sup>。

S.W. 阿什利是 20 世纪初叶英国经济史家之一。他的作品中穿插着土地流动的某些观点。在他看来,17、18 世纪人们购置土地的原因可归纳为两个方面。“其一,土地是安全的投资;其二,如汤因比指出的,与当前的政治制度有关,如果地主不是傻子和醉汉,就会知道大规模的土地能给他带来治安法官的职位。”<sup>⑤</sup>他认为,海外贸易资金和家庭限嗣授产制促成了大地产。他说,“17 世纪最后 15 年和 18 世纪前 10 年,英国从急剧扩张的海外贸易中获得了巨额财富,政府利用公债的形式从私人手中借用这些钱财,这就导致与土地行业平分秋色的金融行业的产生,由于英国贵族特征以及政府制度的特殊性,金融资本被用于置田买地,加入到土地等级的行列当中。靠商业致富的人们也购置田产、建立土地家族;土地家族的男子通过与城市富户女儿的结合,利用女继承人的财富巩固乡村地产;大地产一旦

① 关于英国工业化时期的时间界定,详见拙文《工业化时期英国地产代理制度透视——兼与中世纪庄官组织相比较》,《世界历史》2011 年第 3 期。

②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第 792–793 页。

③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 1 卷,第 797 页。

④ Arnold Toynbee, Lectures on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of the 18th Century in England, London: Waterloo Place, 1887, pp. 62–63.

⑤ William Ashley,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 An Outline Histo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28, p. 128.

建立起来,就会通过家庭限嗣授产的方法保留起来。”<sup>①</sup>

在 B.J. 贝克特的相关研究中,存在着土地流动的一系列论点。他反对强调家庭限嗣授产和长子继承在土地集中作用的观点。他认为,“19 世纪以来,人们突出了家庭限嗣授产制和长子继承法对土地集中的关键作用。认真分析,就会发现,家庭限嗣授产在土地巨头土地积累过程中的作用并不像渲染的那么大。”<sup>②</sup> 贝克特肯定了遗嘱在地产积累过程中的作用。他说,“对土地所有者来说,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到 1760 年是一个黑暗的时代。那一时期,贵族和乡绅家庭断绝男嗣的比率为 1/6。如果人口因素阻碍了地产通过婚姻或男性继承人成年的方式进行移交,那么,相当多的土地是通过遗嘱的方式进行移交的。”<sup>③</sup> 贝克特突出了市场在土地流动中的作用。他认为,“在需要之时,大土地所有者会卖掉手中的土地。为打破家庭限嗣授产的限制,他们常常通过议会法令扫除束缚。土地源源不断地被推向市场。”<sup>④</sup> 贝克特否定圈地运动对自耕农的消除作用。他提出,“议会圈地运动对敞田的围圈并不能使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大量地减少,直到 19 世纪末,小块土地仍大量存在。”<sup>⑤</sup>

在 G.E. 明格的《十八世纪英国土地社会》一书中,点缀着土地流动的系列论点。他把土地流动与社会地位、权力联系起来,认为,“土地社会的统治权力从地产财富上衍生而来。贵族是上院的成员并控制着政府。乡绅是下院的成员并控制着地方行政事务。自由持地农是选民,填充较低的职务,如教堂看护员、教区救济人员、测地员等职。”<sup>⑥</sup> 以土地社会等级分层和权力建构为基础,明格提出了土地集中的论点。他认为,“从 17 世纪晚期开始,有利的条件使大土地所有者以牺牲小乡绅和自耕农的利益为代价,把土地集中起来。到 18 世纪中叶,大地产已经建立起来,大地产的所有者占据了政府。”<sup>⑦</sup> 明格还把大地产的确立归因于婚姻、继承、通过在政府供职和海外扩张取得财富购置地产、大地产所有者吞并小自由农等方式。他认为,“婚姻和继承是一个家庭取得并维持其巨额财富的最重要手段。政府供职和海外冒险活动使财富快速而又大幅度的增长成为可能。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地主在政府中供职,这可以帮助他们扩大地产并使生活水平提高到一个新的标准,但这种方法在所有扩展地产的途径中居于次要地位。18 世纪早期,在单位面积收益上,大地主可能不及中等地主——乡绅,但大地主的土地分布广,收入渠道多,这就使他们受战争税和农业困境的影响小。小土地所有者的境况则相反,在战争税和农业困境的侵扰之下,他们的土地渐渐落入大土地所有者或新来者之手。”<sup>⑧</sup>

卡洛·M. 奇波拉从市场购买和土地的社会价值两个层面,提出了土地流动的论点。他认为地主购买是大地产形成的主要原因。18 世纪初,地主购买土地的动机何在呢? 他说,“从经济的角度说,大规模出租土地肯定是有利的,这就促使地主从农民那里购买土地然后再出租给承租代理人,为了提高地

① William Ashley, *The Economic Organization of England: An Outline History*, London: Longmans, Green and Co. Ltd., 1928, p. 125.

② J.V. Beckett, "The Pattern of Landownership in England and Wales, 1660-188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7, no. 1 (February 1984), pp. 8-9.

③ J.V. Beckett, "The Pattern of Landownership in England and Wales, 1660-188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7, no. 1 (February 1984), p. 10.

④ J.V. Beckett, "The Pattern of Landownership in England and Wales, 1660-188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7, no. 1 (February 1984), pp. 10-11.

⑤ J.V. Beckett, "Landownership and Estate Management", in Joan Thirsk,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1750-1850*, vol. 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p. 560-561.

⑥ G. 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pp. 3, 8.

⑦ G. 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p. 15.

⑧ G. 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pp. 78-79.

产的收入,地主还以高利率向这些承租代理人提供相当一部分资本。于是,抵押地产的交易便日益增多(因为只要手段内行,使用抵押农田所获得的贷款比经营农田更为有利可图),‘承租代理人’也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信贷了。至于社会性质,……到了十七世纪末,由于政治结构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与政治上崭露头角,几乎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是地产的拥有者;而在过去,一个人要想在土地所有者阶层中谋取较高的地位,他就必须从事政治活动。”<sup>①</sup>

在克拉潘的《现代英国经济史》一书中,同样分散着土地流动的某些观点。他写道,“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初期,英格兰的土地已渐渐从小所有主——小乡绅和自耕农——手里转移到其本身继续不断由经商出身的富人来补充的那个统治阶级手里。这种土地转移在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期仍继续进行。……没有古老的公共权利,一块小持有地是不会有有多大用处的,而这种权利的丧失也未必能有适当的补偿。在土地重新分配时,分得土地的人必须设围。对于小农来说,费用未免太重;他可能决议把地卖掉,用所得的价款去围圈一个租来的田庄或者去经营贸易,否则就难免债台高筑。”<sup>②</sup> 经济史家大卫·斯普林则简单提出了土地流动的论点。他认为,“从 18 世纪中期到 19 世纪中期,一些家庭通过婚姻、继承和购买的途径扩充地产。”<sup>③</sup>

当前,在一些经济史家的作品中,仍然点缀着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的学理式推断。比如,朱利安·霍皮特从市场购买和家庭限嗣授产两个层面,提出了土地流动的某些论点。他说:“从 18 世纪初到 18 世纪末,大地主和乡绅手中的土地又多了 10%,活跃的土地市场为地产的购买或扩展提供了条件。1680 年土地价格处于低谷,到了 1720 年代明显上涨,南海泡沫事件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前,土地的购买价格在其年租金价值的 20 倍左右徘徊,1730 年上升到 25 倍。土地购买并不是 18 世纪初叶大地产形成的唯一原因,家庭限嗣授产制为防止继承人变卖全部或部分的地产提供了法律依据。”<sup>④</sup>

在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的学理式讨论中,西方学者提出了土地流动的多种路径,诸如圈地运动、市场流动、家庭限嗣继承等。每一种路径只是停留在观点提出或观点争论的阶段。在每一种路径下,土地流动是如何展开的? 这一问题超越了学理式讨论,属于专题研究的范畴。

## 二、关于圈地运动专题研究的分类综述

长期以来,圈地运动一直是西方经济史、社会史和历史地理学界共同关注的话题。20 世纪初叶以来,西方学者关于圈地运动的专题研究主要分为五个类别。

一是对圈地运动社会效应的研究。比如,在哈蒙德夫妇看来,“在公共土地并入资本型农场的同时,茅舍农和小农场主遭了殃。”<sup>⑤</sup> G.E. 明格则认为,“从经济方面考虑,圈地运动为农场土地的理性化利用、低产荒地和沼泽的改造开辟了道路。从社会方面考虑,并非所有的圈地都引起了农村社会的损失和痛苦;圈地具有地区性,18 世纪末 19 世纪上半叶英国的社会动荡由一系列原因引起。”<sup>⑥</sup> 斯坦福·E. 赖姆贝格提出:“圈地运动主要局限于米德兰地区,而且那里的圈地也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因而减少

① 卡洛·M.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十六和十七世纪》第 2 卷,贝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264—265 页。

②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姚曾虞译,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33—137 页。

③ David Spring, *The English Landed Estat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ts Administration*,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63, p. 55.

④ Julian Hoppit, *A land of Liberty England, 1689–1727*,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2000, pp. 348–350.

⑤ J.L. Hammond and B. Hammond, *The Village Labourer*, New York: Longman Group Ltd., 1978, p. xvii.

⑥ G.E. Mingay,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England: An Introduction to Its Causes, Incidence and Impact, 1750–1850*, Essex: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97, p. 148–149.

了对社会的冲击。1689年,英格兰有一半的土地仍处于敞田的状态,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几乎没有受到圈地的影响。因而,认为圈地运动对人们造成了伤害是一种错误。”<sup>①</sup>

二是对公共权利的关注。比如,W.H.R.卡特勒认为,18、19世纪公共土地弊多利少,圈地对穷人掠夺的说法夸大其词,圈地法令对小土地持有者做出了诸多让步。<sup>②</sup> R.A. 巴特林提出,“公共权利的消失只是表面现象,结构与法律的变革则是农业进步的必要条件。”<sup>③</sup> C.J. 多尔曼说,“敞田效率低下由集体决定所致,农业的进步使个体决定成为必要,效率问题并非敞田在欧洲流行几个世纪的原由。”<sup>④</sup> J.M. 尼森以北安普敦郡为个案研究圈地运动。她提出,“18世纪以及19世纪早期,公地的享有者和茅舍农可以到公田和荒地上放牧,没有土地的人也可以在这些土地上寻找燃料、食物或其他物资,公共权力使这些人作为农民生存了下来,直到议会圈地运动时期。”又说,“在大多数村庄里,议会圈地运动破坏了农民经济,不仅小经营者和小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数量大幅下降,而且无地的公权享有者赖以生活的基础遭到破坏。”<sup>⑤</sup>

三是从田制或历史地理入手研究圈地运动。比如,琼·瑟斯克利用英国地区分工对传统的圈地研究提出质疑,她说:“在最为拙劣的报道中,所有的英国人都将他们的土地围圈起来转化为牧场,因为羊毛比其他的任何农产品都更有利可图;这种报道还认为圈地运动以野蛮的方式展开,置小农场主和茅舍农的利益于不顾,是社会动荡和社会悲惨现象的根源。然而,如果对上述报道进行片刻的思索,我们就会对其精确性产生怀疑,除了并非所有的地区都适合养羊的事实,20年前对伦敦16世纪食品市场的研究表明,当时英国不同地区食品生产呈现出专业化分工的现象。不同的地区间,圈地的重要性及特征因地区而异。”<sup>⑥</sup> J. 耶林认为,“必须考虑圈地运动的地区差异,其进程和地理分布在总体上不尽相同。”<sup>⑦</sup> M. 特纳指出,“英国20世纪地理的诸多显著特征与圈地委员会有着密切关系。”<sup>⑧</sup> 斯坦福·E. 赖姆贝格认为,“现代历史学家们普遍认为圈地运动的重要性被夸大了。并非英格兰所有的土地都适合于围圈,因为这些土地并非都是可耕作性敞田,也并非所有适合于围圈的土地都变成了围田,因为谷物仍是人们的需要。”<sup>⑨</sup>

四是对圈地运动与地产大小之间关系的争论。比如,G. 斯拉特认为,“对耕作性敞田和公共土地进行的围圈扫除了小块持有地。”<sup>⑩</sup> A. H. 约翰逊则提出相反的观点,他说,“圈地运动的首要效果就是使

① Stanford E. Lehamberg,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the British Isles: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1688, Routledge, 2002, p. 257.

② W.H. R. Curtler, The Enclosure and Redistribution of our Land,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20, p. iii.

③ R.A. Butlin, "The Enclosure of Open fields and Extinction of Common Rights in England, 1600-1750", in H.S.A. Fox and R.A. Butlin, eds., Change in the Countryside: Essays on Rural England, 1500-1900, London: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1979, p. 78.

④ C. J. Dahlman, The Open Field System and Beyo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4.

⑤ J.M. Neeson, Commoners: Common Right, Enclos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1700-182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i, 223.

⑥ Joan Thirsk, Tudor Enclosure, Londo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1959, pp. 3-4.

⑦ J. Yelling, "Agriculture, 1500-1730", in R.A. Dodgshon and R.A. Butlin, eds., An Historical Geography of England and Wales, London: Academic Press Ltd., 1978, pp. 181-183.

⑧ Michael Turner, English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ts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conomic History, Kent: Wm Dawson & Sons Ltd., 1980, pp. 16-18.

⑨ Stanford E. Lehamberg,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the British Isles: From Prehistoric Times to 1688, Suffolk: St. Edmundsbury Press, 2002, p. 257.

⑩ G. Slater, The English Peasantry and the Enclosure of Common Fields, London: Archibald Constable & Co. Ltd., 1907, p. xii.

农民数量出现了膨胀,商品化农业的发展是导致小土地所有者覆灭的根本原因。”<sup>①</sup>

五是关于圈地运动与土地产权问题的研究。20 世纪晚期以来,随着美国新制度学派的两位经济学家由于提出基于产权的理论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sup>②</sup>,土地产权问题成为研究圈地运动问题的新动向。比如,M. 奥弗顿提出,“圈地运动是土地产权变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公共财产权利被废止。”<sup>③</sup>

以上关于圈地运动专题研究的分类综述表明:在有关圈地运动问题的探讨中,西方学者研究的内容尽管比较广泛,但专门以土地流动为视角,解剖圈地运动的作品还没有出现。

### 三、关于土地的市场流动专题研究综述

20 世纪中叶至晚期,西方学者对 18 世纪英国土地市场的讨论,大致分为两个派别。一派以 H.J. 哈巴卡克为代表,肯定 18 世纪晚期以前土地市场流动的重要性。1940 年代,哈巴卡克探讨了 18 世纪英国的土地市场与土地社会。他认为,“在 1690 年后的 60 年间,地产运动的总趋势有利于大地产的形成。富有的新来者没有被排除在外,他们进入土地市场、购买旧乡绅的土地,日益形成土地巨头。”<sup>④</sup>又认为,“随着贵族与乡绅(或小的自由持地农)之间经济差距的拉大,18 世纪初期活跃的市场为土地集中增加了机会,随之而来的是土地销售量的减少。到 18 世纪晚期,靠购买小块土地膨胀起来的大地产所有者维护并巩固着他们已经获得的地位。”<sup>⑤</sup>1960 年代,G.E. 明格把大部分土地集中于贵族之手的时段确定为 18 世纪,并进一步肯定了哈巴卡克的观点<sup>⑥</sup>。

另一派以 F.M.L. 汤普森为代表,否认了哈巴卡克、明格的论断。在 1960 年代晚期出版的一本题名为《农业变革与经济发展》的论文集中,汤普森写道:“哈巴卡克逻辑的坚固性和信服性令人质疑,我们至少怀疑那种认为土地的销售量在 18 世纪下半叶减少了的观点。”<sup>⑦</sup>在汤普森研究的基础上,B.A. 霍尔内斯以林肯郡为个案,探索了土地市场的运作状况。他认为,“在总体上,土地市场的活跃和大地产形成之间的关系与哈巴卡克和明格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18 世纪中期,林肯郡的土地对于赫尔、利兹、设菲尔德和诺丁汉郡的新富们具有强劲的吸引力,对于都市里的购买者来说,这种吸引力仍在持续。在 18 世纪,林肯郡居民购买土地的活动比任何时期都要活跃,购买者包括放牧人、制革商、法律界人士、土地管家等。”<sup>⑧</sup>1990 年代,C.G.A. 克莱以斯陶尔黑德地产为个案,研究了 18 世纪晚期以后的土地市场问题,批驳了哈巴卡克及其追随者的观点。他说:“哈巴卡克爵士在其早期关于土地社会的

① A. H. Johnso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mall Landowner*,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7, p. xii.

② 1991 年,芝加哥大学的罗纳德·H·科斯,1993 年,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道格拉斯·诺斯分别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小罗伯特·B·埃克伦德、罗伯特·F·赫伯特:《经济理论和方法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年,第 3 页)。科斯和诺斯都属于美国新制度学派的代表人物,他们提出的理论范畴与经济史上的产权相关。

③ Mark Overton, *Agricultural Revolution in Engl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Agrarian Economy, 1500–185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147.

④ H.J. Habakkuk, "English Landownership, 1680–17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a10, no. 1 (February 1940), pp. 2–17.

⑤ B.A. Holderness, "The English Land Marke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Case of Lincolnshir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7, no. 4 (November 1974), pp. 557–576.

⑥ G.E. Mingay,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63, pp. 19–107.

⑦ F.M.L. Thompson, "Landownership and Economic Growth in England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in E.L. Jones and S.J. Woof eds., *Agrarian Chang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ondon: Methuen, 1969, pp.42–49.

⑧ B.A. Holderness, "The English Land Marke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he Case of Lincolnshir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7, no. 4 (November 1974), pp. 557–576.



论述中,认为随着储蓄灵活性和回报的增加,18世纪的商人们已不像先辈那样把储蓄投资于土地。近来,还有一些学者得出相同的结论,比如,尼古拉斯·罗杰斯、劳伦斯·斯通、J.C.F. 斯通。我对这一时期土地市场的研究则得出了与之相反的结论;至少到北美战争时期,尚有更多的货币资本投放到地产市场,用于土地购置。”<sup>①</sup>

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者以《经济史评论》<sup>②</sup>杂志为阵地,就富商在19世纪是否参与了英国土地市场展开激烈争论。这场争论主要在两派之间展开。一派以F.M.L. 汤普森、D. 斯普林、E. 斯普林、珀金、多顿为代表,他们强调富商对19世纪土地市场的参与。1992年,F.M.L. 汤普森在《经济史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问题重新缝合》的文章,与反对派人物W.D. 鲁宾斯坦展开商榷。汤普森在文中指出:“鲁宾斯坦坚持认为19世纪的商人没有参与任何规模的土地购置,其研究对象为1873-1875年间死亡、遗产为100000英镑以上的少数富有者。我的文章《死亡之后的生命》则以1809-1893年死亡、遗产为1000000英镑以上和1809-1860年死亡、遗产为500000-1000000英镑的上层富有者为研究对象,总共111人。这些人及其下一代把商业财富源源不断地输入农村。文中的每一个体都占有重要的地位,要颠覆我的结论就必须对他们逐一检验。这种方法在技术上叫做‘查尽富豪’。不论怎么检验,都可以得出维多利亚时代富豪们购买土地的结论。”<sup>③</sup>另一派以L. 斯通、J.C.F. 斯通和W.D. 鲁宾斯坦为代表,否认富商参与土地的购买。1992年,在一篇题为《查尽富豪》的回复汤普森的文章中,鲁宾斯坦开宗明义地写道:“汤普森声称从新的材料出发论证了此类问题,但他的主要结论并非精确,具有误导性。这里,我将利用新的资料再次说明:19世纪商人并未参与任何规模的地产购置。”<sup>④</sup>

以上关于土地的市场流动专题研究综述表明:1940-1990年,西方学者对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市场问题争论的时段集中在18世纪,主要讨论商人对土地的购置;1990年代以来,他们争论的时段转移到了19世纪,主要讨论富豪购买土地的问题。以整个工业化时期为研究时段,以社会各阶层为研究对象的土地市场流动,有待于展开。

#### 四、关于土地社会价值与土地流动关系专题研究的综述

19世纪晚期以来,欧洲学者在研究工业化时期英国农村社会某些问题的过程中,触及到了社会地位和土地拥有之间的关系,提出了有关土地社会价值的观点。阿诺德·汤因比是土地社会价值的首倡者。在本文第一部分,笔者提及了汤因比关于土地是人们获取社会政治地位的基础的简单论断。汤氏论断是西方学者们探讨此类问题的经典依据。

20世纪初叶,亚瑟·H.约翰逊从“土地与政治权力的关系”出发,分析了地主和工商业者购买土地的动机。他写道:“1688-1900年,英国社会剧烈变动,土地所有权是人们长期以来确立和稳定其社会地位的唯一依据,是获得政治权力最为简单的凭借。在18世纪,这种观念与日俱增,新富们为此介入土地的购买。一旦拥有地产,绅士就能够在地方社会确立自己的地位;如果言谈举止彰显了其低微的

① C.G.A. Clay, "Henry Hoare, Banker, His Family, and the Stourhead Estate", in F.M.L. Thompson ed., *Landowners, Capitalists, and Entrepreneurs: Essays for John Habakkuk*,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94, p. 113.

② 1926年7月,由艾伦·鲍尔(Eileen Power)、R.H. 托尼(R.H. Tawney)、E. 李普森(E. Lipson)三人倡导,在牛津大学成立了“经济史学会”(Economic History Society),出版会刊《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1927年,《经济史评论》正式创刊。

③ F.M.L. Thompson, "Stitching It together ag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5, no. 2 (May 1992), pp. 362-375.

④ W.D. Rubinstein, "Cutting up Rich: A reply to F.M.L. Thompso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5, no. 2 (May 1992), pp. 350-361.

出身,他就会把希望寄托在下一代的身上。如果郡守不能代表所在的郡参加议会,他就会削减自由持地农的数量,增加终身租地农的数目,以此扩大自身的影响,使其投票变得日益重要。土地所蕴含的社会价值超过了农业经济价值,资产者通过购买土地以满足个人嗜好、准备投机、施展志向。”<sup>①</sup>

20 世纪 60 年代,F.M.L.汤普森考察了 19 世纪土地社会内部主要群体的生活,提出了土地“社会投资功能”的概念。他说:“利用新增财富获得社会地位的重要方法就是购买土地。这并不是一种崭新的现象。长期以来,人们在商业、财政、法律中获得的财富通过土地市场进入了地产领域。18 世纪,地产购置作为纯粹经济投资的功能以及安全储蓄的功能已经减弱,但其社会投资功能、建立土地家族的功能却在延展。”<sup>②</sup>在谈及购买土地的动机时,汤普森说:“尽管人们购买土地的目的多种多样,但其中一个动机与社会地位密切相关。”<sup>③</sup>

20 世纪 60-90 年代,在其不同的作品中,明格多次提出土地的“两重价值”说。他认为,土地是衡量人们社会地位的价值尺度。他写道:“一般说来,在乡绅中,财富与级别相一致。16 世纪中期,对修道院土地的没收以及王室土地的变卖,为人们社会地位的上升提供了条件。此后 100 年间,由于内战、王位复辟等事件,一些家族的社会地位上升,有些家族则反之。”<sup>④</sup>又说:“第一,土地受到投资者的青睐,因为它作为财富贮藏的手段既安全又长远,与房屋、政府公债、英格兰银行股份以及海外贸易公司相比较,其危险性可以忽略不计。它还可以用财富的形式传之子孙,或作为担保借贷,或作为筹码同其他富豪家庭联姻。第二,当人们拥有土地的数量到达一定程度,它就能够赋予拥有者以社会地位、声望以及他们作为郡的法官或议会成员而享有的权力。”<sup>⑤</sup>明格还找出了积极扩展土地的两类群体。“第一类是较大的土地所有者,他们拥有丰厚的土地收入,常常通过把持职位的方法扩大土地收入。这些土地所有者对土地怀有深厚的感情,因为购置土地可以巩固他们现有的财产,发展他们的田园,增加他们对选举人的影响力。第二类是新近的土地购买者,他们通常来自商界和职业界,这其中包括新任的政治家、战争供货商、工业家、海军和陆军军官。他们时常购买中等或小块地产,以它们为中心,反复购买小块土地,建立较大的地产。”<sup>⑥</sup>

20 世纪 70 年代,卡洛·M. 奇波拉解读了政治与土地的关系。他写道,“至于其社会性质,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到了十七世纪末,由于政治结构发生了剧烈变化,一个人要想在社会上与政治上崭露头角,几乎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他必须是地产拥有者;而在过去,一个人要想在土地所有者阶层中谋取较高的地位,他就必须从事政治活动。”<sup>⑦</sup>

20 世纪 80 年代,J.V. 贝克特提出了“土地与社会优先权”的论点。他说:“从 17 世纪起,既定的社会模式为家庭购买土地提供了前提。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土地仍是人们进行社会和政治考量的关键。一个家庭拥有的土地越多,获得优先权的机会就越频繁。土地代表着财富、稳定性与持续性,还代表着获得统治权利的固定利益。大量土地的拥有意味着其所有者早晚要进入社会或政治权力的圣地。”<sup>⑧</sup>又说,“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取决于他所控制的土地数量,社会向地主赋予了从地方治安法官到议

① Arthur H. Johnson,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Small Landowner*, Oxford: The Clarendon Press, 1909, pp. xiii, 119-121.

② F.M.L. Thompson, *English Landed Socie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3, p. 21.

③ F.M.L. Thompson, "Stitching it together again",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45, no. 2 (May 1992), p. 371.

④ G.E. Mingay, *The Gen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6, p. 4.

⑤ G. E. Mingay, *Parliamentary Enclosure in England: An Introduction to Its Causes, Incidence and Impact, 1750-1850*, Essex: Addison Wesley Longman, 1997, pp. 55-56.

⑥ G.E. Mingay, *The Gentry: The Rise and Fall of a Ruling Class*, London: Longman Group Ltd., 1976, p. 69.

⑦ 卡洛·M. 奇波拉:《欧洲经济史》第 2 卷,贝昱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 年,第 265 页。

⑧ J.V. Beckett, *The Aristocracy in England, 1660-1914*,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1986, pp. 43, 128.



员等一系列责任。”<sup>①</sup>

20 世纪 90 年代,E.P. 汤普森提出了“土地与权力基础”说。他认为,“土地仍旧是富有影响力的指数,是权力的基础。人们倾向于把土地与乡绅联系起来。如果一个人的土地财富和地位同时得以提高,他将会发现,财富的规模至关重要。这种财富既包括直接服务于农业的产业(如运输业、马具业、辐轮制作业),也包括农产品加工业(如酿造业、鞣皮业、磨粉业、毛纺业等)。不论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布里斯托尔、伯明翰、诺里奇取得怎么样的发展,1760 年代的英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国家。许多在城市中、商业中发了家的人们,仍旧通过把财富转化为土地的方法,取得乡绅的地位。”<sup>②</sup>

21 世纪初,托马斯·威廉·海克提出了“土地与社会等级阶梯”的论点。他说:“土地财产是社会等级的基础,土地创造了国家的财富,并赋予劳动者以工作的机会。土地是声望的源泉、通向地位的阶梯。拥有地产业会使人们的地位上升到社会等级阶梯的顶部,并获得相应的政治权力。在 18 世纪,土地价格昂贵,土地流动呈现出两大规律:一、财富拥有者争先恐后地购买土地;二、地主要保证其土地的完整性。”<sup>③</sup>

以上关于土地社会价值的综述表明:19 世纪晚期以来,西方学者以不同的措辞,表达了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社会价值的论点;也有的学者以此为基础,看到了土地社会价值与土地流动之间的联系。不过,对于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社会价值与土地流动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的研究仅限于观点提出阶段,具体的实证研究有待于展开。

## 五、关于继承与土地流动专题研究的综述

家庭限嗣授产制(strict family settlement)在近代英国大地产形成过程中究竟处于怎样的地位? 19 世纪晚期-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西方学者一直强调这一制度在家庭地产积累过程中的作用。19 世纪晚期,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包括 G.C.布罗德里克、G.肖-勒费弗尔、P.M. 劳伦斯、T.E. 斯克鲁顿、E.塞西尔<sup>④</sup>。至 20 世纪中叶,H.J.哈巴卡克是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限定继承是地主为子孙提供土地、保持土地在家庭传承的核心内容;为了给女儿嫁妆(dowry),地主抵押土地贷款,女婿用这笔款项购买土地,作为新娘的寡妇地产(jointure),女婿的女婿又重复这一过程;由于家族限嗣授产的作用,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整体相互提携、拥有更多的土地;限嗣授产制是使旧的大地产紧密凝聚、同时又是防止新形成的大地产分散的制度安排。”<sup>⑤</sup>在其研究的链条中,哈巴卡克既忽略了绝嗣现象,又忽略了土

① J.V. Beckett, "Landownership and Estate Management", in Joan Thirsk, ed., *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 1750-1850*, vol. 6, p. 545.

② E.P. Thompson, *Customs in Common*, London: Penguin Books Ltd., 1991, p. 16.

③ Thomas William Heyck, *A History of the Peoples of the British Isles from 1688 to 1914*, London: Routledge, 2002, p. 53.

④ G. C. Brodrick, *English Land and English Landlords*, London: Cassell, Petter, Galpin & Co., 1881, p. 152; G. Shaw-Lefevre, *Agrarian Tenures: A Survey of the Laws and Customs Relating to the Holding of Land in England, Ireland, and Scotland, and of the Reforms therein during Recent Years*, London: Cassell & company, Ltd., 1893, pp.5-9; P. M. Laurence, *The Law and Custom of Primogeniture*, Cambridge: J. Hell & Son, 1878; T.E. Scrutton, *Land in Fetters, Or the History and Policy of the Laws Restraining the Alienation and Settlement of Land in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886; E. Cecil, *Primogeniture: A Short History of Its Development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Its Practical Effects*, London: J. Murray, 1895.

⑤ H. J. Habakkuk, "English Landownership, 1680-174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a10, no. 1 (February 1940), pp. 6-8; H.J. Habakkuk, "Marriage Settlemen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vol. 32, 4th series (1950), pp. 28-29.

地抵押贷款利率高于土地资本投资收益率的事实,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之后,其学术观点受到了严峻挑战。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T.H. 霍林斯沃思发表了《英国贵族的人口统计》一文。该文以量化数据表明,1660 年后的一个世纪内,英国贵族经历了一个绝嗣周期<sup>①</sup>。以霍林斯沃思关于英国贵族绝嗣的数据为基础,西方学者开始质疑家庭限嗣授产制在地产积累中的作用。克里斯托弗·克莱从女性和旁系继承的视角诠释了工业化时期英国大地产的兴起。他认为,“1670–1749 年,英国贵族存在着生物上的失败(biological failure),在 5 位贵族男性中,能够繁育下一代男性继承者的仅有 4 位。以此为基础,他提出假设,贵族在生物学上的失败同样适用于乡绅;并进一步推断,由于部分地主在生物上的失败,更多的家庭没有男嗣,更多的土地落入女性继承人或旁系亲属之手。”又提出,“女性或旁系继承人获得的土地面积越大,出售的可能性就越小,而小乡绅和自耕农家庭通过这种继承方式在市场上出售土地的频率较高。18 世纪中期以后,地主阶级从生物失败中得以缓解,断绝男嗣的土地家庭愈益减少,越来越少的土地通过女性继承人和旁系家族在市场上转手,土地社会变化的节奏趋缓。”又认为,“嫁妆在扩展土地方面的作用被人们夸大了。在哈巴卡克研究的时段,土地抵押贷款利率(5%–6%)高于土地的资本投资收益(4%),即使在对地主和农场主特别有利的 1790–1813 年,农业投资利率的快速增长也难以弥补这个沟壑。”<sup>②</sup> 克里斯托弗关于乡绅在生物学上的失败并没有依据,只是一种假设,其解释逻辑的链条出现了中断了的一环;同时,他也没有验证自己提出的小乡绅和自耕农出售旁系继承土地的假设。

劳埃德·邦菲尔德通过建立贵族跨代继承模型,否定了家庭限嗣授产制在大地产兴起中的作用。他根据模型,“计算出 1680–1740 年英国贵族的再授产率(rate of resettlement,即能够活到长子结婚时父亲的比重)还不到 1/3。”他认为,“跨代继承模型对再授产率的计量说明,哈巴卡克的再授产模式是例外而不是规律;晚婚、高死亡率和男孩偏少这几大因素排除了再授产的发生;没有再授产,男性继承人就以自由之手占有祖产;家庭限嗣授产和大地产兴起之间的联系只是人们的错觉。”<sup>③</sup> J.V. 贝克特认为,“1660–1880 年,家庭限嗣授产在土地巨头积累土地过程中的作用有限,主要原因在于绝嗣,男嗣断绝率为 1/6。肯特郡、约克郡等地的个案说明,仅有极少数的新郎家庭利用嫁妆购买土地;土地上附带的政治和社会特权是工商业资本对之趋之若鹜的原因。”<sup>④</sup>

克里斯托弗等挑战者忽略了一个事实,那就是,那些绝嗣地主的继承者会再次通过家庭限嗣的方法,把继承的土地纳入家庭限嗣继承的范畴。另外,无论是 19 世纪晚期到 20 世纪 60 年代中期赞成家庭限嗣授产制促就家庭地产积累的学者,还是 20 世纪 60 年代后期以来对此问题持否定态度的学者,他们讨论的主题都局限于家庭限嗣授产制与土地家族地产扩展之间的关系。另外,在上述争论之外,一些否定家庭限嗣继承制促成大地产的学者,比如克里斯托弗·克莱,开始关注婚姻继承和旁系继承与大地产的兴起。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家庭限嗣继承,还是婚姻继承和旁系继承,都涉及到了血亲关系和土地的传承;然而,上述争论的双方均没有从血亲关系的视角观察土地流动。血亲关系与土地流

① T.H. Hollingsworth, "The Demography of the British Peerage", Supplement to Population Studies, vol. 18, no. 2 (1965), pp. 103–108.

② Christopher Clay, "Marriage, Inheritance, and the Rise of Large Estates in England, 1660–1815",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21, no.3(December 1968), pp.508–509,515–517.

③ Lloyd Bonfield, "Marriage Settlement and the 'Rise of Great Estates': The Demographic Aspect",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2, no. 4 (November 1979), pp. 491–492.

④ J.V.Beckett, "The Pattern of Landownership in England and Wales, 1660–1880",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vol. 37, no. 1 (February 1984), pp. 8–9.

动问题超越了上述两派学者的视野,将是土地继承问题上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

除却以上五个类别的研究,在一些有关土地家族的个案研究当中,也散布着土地流动的相关问题。比如,J.R.沃迪研究了18世纪-19世纪30年代利文森-高尔家族地产上的土地管理问题,认为贵族的社会地位由其对土地的所有关系决定,巨额的土地财富源于婚姻。他提出,“1700-1800年间,英国是贵族国家而非君主国家,更非共和国。这一时期,作为统治者的英国贵族不能简单地被看作是上院议员,诸多的政界要员以下院议员的身份从事政治生涯。这些要员的共同特征是对土地拥有所有关系。对土地的所有关系而非贵族头衔决定了贵族的社会地位。”<sup>①</sup>对土地的所有关系又由何而来呢?他认为,“如果政治上的忠诚赋予他们以头衔,那么,一系列幸运的联姻和继承会给他们以物质资源,支撑其尊贵的头衔。在利文森-高尔家族,绝嗣从未出现过,该家族通过婚姻继承的方法取得了巨额土地财富。家族社会地位的四次上升就是通过四次连续的婚姻和继承,取得财富而致。”<sup>②</sup>在J.R.沃迪的研究中,分散着有关社会地位、婚姻继承在土地流动中作用的论述。这类研究表明:以土地家族为个案,专门研究土地流动的作品在西方经济史学界仍旧是空白。

## 五、结 语

19世纪晚期以来,在西方学界,那些涉及到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的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的研究属于学理式的解读。在此类研究中,尽管经济史家们提出了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的多种途径,但这种类型的研究仅仅限于论点的提出(或观点的争论)。第二种类型的作品属于专题研究。经济史家们的探讨涉及到了圈地运动、市场与土地流动、土地的社会价值、继承视角下的土地流动。然而,专门以土地流动为视角,解剖圈地运动的作品还没有出现;以整个工业化时期为研究时段,以社会各阶层为研究对象的土地市场流动,有待于展开;关于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社会价值与土地流动之间的关系,西方学者的研究仅限于观点提出阶段;以血亲传承为视角,探讨土地流动问题,将是土地继承问题上一个崭新的研究领域。第三种类型属于土地家族的个案研究。在这类研究中,散布着土地流动的某些论证,不过,以土地家族为个案,专门研究土地流动的作品仍然是西方经济史界的空白。另外,在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土地流动、工业化三者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以上三种类型的研究均没有涉及。

上述分析表明,从圈地运动、土地市场、土地的社会价值、血亲关系等多重视角出发,透析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土地流动,并进一步诠释农业劳动生产效率、土地流动、工业化三者之间的关系,将是研究工业化时期英国土地流动问题的崭新路径。

---

① J.R. Wordie, *Estate Management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e Building of the Leveson-Gower Fortune*, London: Royal History Society, 1982, p. 1.S

② J.R. Wordie, *Estate Management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 The Building of the Leveson-Gower Fortune*, London: Royal History Society, 1982, p. 3.